

日軍在華北的軍政支配結構與民眾 的因應——以食糧對策為中心 (1937-1945)

姜子浩

摘 要

抗戰爆發後，日軍在華北的勢力範圍由冀東、冀察一帶迅速擴張到華北沿海地區及各大城市，並由各陸軍特務機關在當地扶植、指導協力政權。在華北的日本陸軍特務機關是「北支那方面軍」指揮鏈的在地延伸，機關成員負有指導華北行政事務、為方面軍搜集情資的使命。具體而言，日本特務機關長利用日籍顧問及華北協力者，遙控協力政權及地方社會，建構凌駕於協力政權之上的一套管治網絡。為展現日本特務機關在華北的運作方式，本文先說明其內部的組織及分工，如該機關內部、外圍成員的負責業務、能力及其侷限。其次，以日軍的食糧對策為基軸，從不同角度切入分析占領華北的日軍特務機關在當地軍政支配結構的定位，由此審視日人介入華北地方事務的方式，以及當地協力者的因應。本文提出，日軍在華北的占領架構是一套以「方面軍」、「特務機關」為中心、往外輻射日人政經團體、中國協力政權，再及至地方社會、一般百姓的同心圓結構，而方面軍的特務機關，是此同心圓結構中的關鍵節點。

關鍵詞：協力政權、特務機關、華北占領地、食糧、淪陷區、中日戰爭

Japan's Military-Political Domination of Occupied North China and the Local Chinese Response, 1937-1945

Chi-ho Kiang^{*}

Abstract

Following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in 1937, Japan's North China Area Army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he empire's sphere of influence from part of Hebei to the rest of North China. The task of establishing and controlling collaborative regimes in the area was shouldered by the Army Special Services. These special services were extensions of the army's chain of command as they managed local affairs and collected local intelligence for the military. Working with the Japanese advisors and local collaborators, the heads of these special services constructed a network of domination to manage remotely the society and the regime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o fully reveal the operation of such a network of dominance,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external context and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the special services, explor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strategi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ir members. It then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food insecurity as a window through which in viewing the role played by special services in Japan's military-political domination. This essay suggests that the Japanese army built a dominating structure of concentric circles in North China. The North China Area Army and its special services were at the center of this radiating net of control; the Japanese political-economic groups and the collaborative regimes served at the intermediate level, subordinating to the center. The local society and population were around the edge of outer circle with limited influence. The Army Special Services were thus critical nodes in this imposed structure of occup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Keywords: Collaborative Regime, Special Service, Occupied North China, Food Policy, Occupied Territories, Sino-Japanese War

^{*} Ph. D. Candidate,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日軍在華北的軍政支配結構與民眾 的因應——以食糧對策為中心 (1937-1945)*

姜子浩**

壹、前言

日本帝國對中國華北地區八年的占領，既是史實，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戰時政府體制（form of government）。¹ 不過，當前研究抗戰時期日本占領區或稱淪陷區的論著，多討論日人的上層政治制度及經濟計算，² 或探討協力政權及協力者的活動，³

* 本文承蒙兩名匿名審查人提出寶貴的修正建議，特致謝忱。本文寫作過程，有賴於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和國際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的慷慨支持，以及Urs Matthias Zachmann教授（柏林自由大學）及川島真教授（東京大學）兩位的指點及鼓勵，特此鳴謝。

收稿日期：2022年1月18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3月1日。

** 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¹ Peter M. R. Stirk,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Occupa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4-5.

² 中村隆英，《戰時日本の華北經濟支配》（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加藤陽子，〈從軍事史的角度來看中日戰爭——關於興亞院的歷史定位〉，《抗日戰爭研究》，第91期（2014年2月），頁21-33；蕭李居，《合作或衝突——防共問題糾結下的中日關係（1931-1945）》（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年）。

³ 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6月），頁815-841；張同樂，《華北淪陷區日偽政權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關智英，〈對日協力者的政治構想——日中戦争とその前後——〉（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9

只有少數以個案剖析了日軍如何介入中國政務。⁴ 日本方面從事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研究者，多側重日軍在華的作戰活動及對敵活動，對政務指導的詳情則著墨不多。⁵ 由於日軍在占領區如何指導地方行政，日人擬訂的對策能否落實、貫徹到地方，以及地方社會的因應等，是過往較少受到關注的問題。是以本文分析華北軍政結構及糧食對策之餘，也藉此探討國家權力向地方社會傳導的過程。

日人在華北建立軍政支配結構，而非殖民地，也是一種因時制宜的權宜之計。在反戰、反殖民的1930年代，帝國若要擴張領土，已不能以武力逕行吞併，而需尋找藉口。日方的作法，是先站在支持「民族解放」，維護自國合法利權的大義立場之上，「協助」其他民族建立新政權，同時確立帝國與新政權間「指導者—被指導者」間密不可分的主從關係。例如在滿洲國，當地官僚系統實際受到關東軍司令官、駐滿洲國大使、協和會及日系官吏的內面統轄及指導，成了日本帝國扶植、日本人操控的傀儡國家。在華北，日軍同樣地先於各地扶植治安維持會等所謂的自治單位，再以此為基礎組成臨時政府（對應滿洲國）及新民會（對應協和會），以解放者的身分來建立、掌控新建的他民族政權。⁶ 可以說，「北支那方面軍」（以下稱方面軍）在相當程度上參考了關東軍的建國經驗，有意把華北發展為「第二滿洲國」。⁷

可是日軍的意圖並未能完全實現。具體而言，華北的特殊情勢，使當地的支配結構帶有較滿洲國更濃重的軍政色彩。⁸ 如川島真指出，華北的中華民國臨

年）；Timothy J.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⁴ 相關論著有Odoric Y. K. Wou (吳應銑)，"Food Shortage and Japanese Grain Extraction in Henan,"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巫仁恕，《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⁵ 撰寫戰史者強調日軍在占領區的軍事活動的經過、結果，以及這些軍事活動對地方社會的消極影響。參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戰（1）》、《北支の治安戰（2）》（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1971年）；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戰：日中戦争の実相》（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

⁶ 關智英，《対日協力者の政治構想—日中戦争とその前後—》，頁22-23。

⁷ 阿部助哉，《黄砂にまみれて——ある特務機関員の青春》（東京：時事通信社，1986年），頁4；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戰：日中戦争の実相》，頁66。

⁸ 1937-1945年間，此軍政支配結構基本上始終保持強勢地位。1942年末，因應大量日軍調

時政府始終是作為對日協力「政權」而非「國家」而被扶植起來的，與日本帝國並未建立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⁹ 更重要的是，日軍於華北、華中控制的領土範圍，遠較東北三省遼闊。日軍無法找到足夠的日籍官吏來填充行政崗位，因此須在更大程度依賴在地的協力者來施行管治。¹⁰ 1940年，華北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合流，臨時政府改組為華北政務委員會，但作為地方政權仍殘留著相當的獨立性。¹¹ 中央政權的缺位，加上日本占領並控制華北地區的方面軍一再重申，要在治安戰中加強日華兩國在國防、經濟上的「強度結合」，亦有助於合理化軍方維持對占領地各方面的操控。¹²

當前關注到日占區軍政色彩的學者，如卜正民（Timothy J. Brook）即指出日人的軍事占領是協力政權的存在前提及其根本弱點，表示「占領國家」的發展是「日人、華人共同參與的過程，即使雙方參與的目標與方式並不經常一致」，這也導致了該「國家」未能完全滿足日人及本地協力者雙方的期望。¹³ 而關智英論及中國的協力政權時，亦提到，即使這種支配是日人強加於華北之上的，但占領經驗始終是中日雙方共同形塑的產物，中方的自主性在此是不能完全否定的。¹⁴ 吳應銑（Odoric Y. K. Wou）觀察河南淪陷地區的占領當局（occupation

離中國，御前會議一度改變對中國政策，期望通過裁撤興亞院，改置大東亞省，發動協力政權自主性，藉此獲得更多的國防物資。原來的興亞院亦為大東亞省所取代，但這次的政策轉換是失敗的。1944年9月，「北支那方面軍」（以下簡稱：方面軍）作成了「對華北緊急措置要綱」，決定以日本軍為中心強力推進經濟施策，放棄原來透過大使館、協力政權遙控中國行政系統的作法，要求外交系統、商社、協力政權、新民會等協助軍隊收集、輸送戰略物資及維持地方治安，使得華北的軍政府色彩反而更加強化了。參見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戰：日中戦争の実相》，頁134-137。

⁹ 川島真，〈「傀儡」政權とは何か——汪精衛政權を中心に〉，收入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松元崇、莊司潤一郎、川島真，《決定版 日中戦争》（東京：新潮社，2018年），頁162。

¹⁰ 參見Timothy Brook, "Occupation State Building,"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 22.

¹¹ 川島真，〈「傀儡」政權とは何か——汪精衛政權を中心に〉，收入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松元崇、莊司潤一郎、川島真，《決定版 日中戦争》，頁166。

¹²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戰（1）》，序。

¹³ Timothy Brook, "Occupation State Building,"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p. 23-25.

¹⁴ 關智英，《対日協力者の政治構想—日中戦争とその前後—》，頁40。

authority) 必須利用權威、獎懲及強力，來促進在地中國人的服從，實現對當地資源的榨取。是以占領不應單純被視為一個軍事事實，而是一種尚待研究的「支配—被支配」關係，而這種關係帶來了「獨特的榨取性的支配模式及過程」，吳氏稱之為一種「占領的社會學」。鑑於戰時中國的糧食資源長期短缺，各政權、組織、個體均設法競逐有限的穀物的所有權，探討戰時糧政實有助於凸顯「占領社會學」內在的張力。¹⁵

「占領國家」的概念先由卜正民提出，David Serfass此後又作了精彩的闡發。卜正民點出，占領國家的運作基礎，是由地方的陸軍特務機關（以下稱特務機關）發展本地的協力者，驅使後者在日籍職員的監督下，執行日方的指示。¹⁶ Serfass則認為所謂的「占領國家」囊括了日本軍民機構及本地協力政府。它具有高度廣納性，又缺乏一般國家應有的凝聚力。儘管日軍設法優化該國家的行政效能，但占領國家內部各方日系、華系勢力為政治權力而持續博弈，使這個國家始終難以圓滑地運作。¹⁷

另從Stirk的《軍事占領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Occupation*）考察不同時空的「軍政府」，觀察到作為支配者的軍政府與被支配的民眾，其關係總是緊張的。這不免是由於軍隊龐大單一（monolithic）的組織架構，以及軍事人員所接受的訓練，都不是為管治異民族而準備的。為此，軍隊需引入相對獨立的民間元素（civilian elements）來協助管治。但引入民間元素，顯然又與講究上下關係的軍隊科層架構不盡相容。兩難之下，部分占領者會依賴本地既有的政治結構來建立「有限的、監督取向的行政架構」，期望減少介入本地事務。但他們很快發現，與軍政府合作的本地官員缺乏權威，終究仍須依靠占領者更廣泛及深入地參與本地政務，來改善行政機關的管治效能。在軍政府面臨的諸多威脅中，Strik認為軍政府內在的掠奪性可能瓦解「軍隊—政權」間微妙的共生關係。在軍政府治下，軍方需求一般獲得優先處理，而出於很多原因，軍政府有衝動介入、破壞

¹⁵ Odoric Y. K. Wou, "Food Shortage and Japanese Grain Extraction in Henan,"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 196.

¹⁶ Timothy Brook, "Occupation State Building,"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 39.

¹⁷ David Serfass, "Collaboration and State Making in China: Defining the Occupation State, 1937-1945,"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7:1 (January 2022).

原來的本地權力結構，卻不一定有相應的意圖、資源、組織力去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結構，以滿足軍隊及民眾的基本需求。軍隊的破而不立，造成地方權力結構的碎片化及占領地社會的失序。¹⁸

Stirk闡述軍事占領下各地軍政府所出現的共同特徵及弱點，相當程度上也適用於刻畫日軍在華北建立的軍政支配結構。卜正民曾提及日軍與協力政權間的衝突，損害了協力政權的行政效能及農村治安。¹⁹ 吳應銑也留意到軍政府的過度掠奪有礙於占領者獲取民心，日人任用的邊緣精英亦多不適任，反成為了協力政權的負擔。²⁰

綜合諸位學者對於戰時中國及軍政府的觀察，可知要考察華北日占區的政治，必須先理解華北日軍是如何介入、「指導」地方政治的。一般認為方面軍主要通過特務機關及協力政權兩者來實施統治。²¹ 在華北地區為了「安定野戰軍的後方地區」，方面軍在師團、獨立旅團司令部駐地，編成特務機關。各地的特務機關並非單純的「諜報謀略」組織，而是同時負責政務指導、治安工作、情報搜集的「大特務機關」。²² 如此，兵團負責「軍務」（治安戰）、特務機關負責「政務」（治安工作），兩種軍事單位在作戰地域內有了明確的分工。特務機關的成員，通過監督、指導於地方政務機關任職的日籍顧問、連絡員、新民會職員，利用他們來操控地方的政治、經濟、教育及社會事務。²³ 由此確立軍方對地

¹⁸ Peter M. R. Stirk,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Occupation*, pp. 5, 53, 63-70, 79-80, 84-87, 97-103.

¹⁹ Timothy Brook, "Occupation State Building,"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 24.

²⁰ Odoric Y. K. Wou, "Food Shortage and Japanese Grain Extraction in Henan,"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p. 181, 197.

²¹ 1937年9月至1939年3月，方面軍內部負責華北地區行政指導事務的是方面軍的特務部。1939年3月10日，興亞院華北連絡部成立後，相關功能逐漸移讓予該連絡部、方面軍特務班及參謀部第四課負責。不過，地方的陸軍特務機關，即使於1943年更名為陸軍連絡部，其在地方行政上的獨特地位及機能始終保留到戰爭結束為止。參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戰（1）》，頁41-45、106-107。

²² 學界對於日本駐華特務機關的研究，多集中於抗戰前，如柯絳，〈日本在華特務機關調查統計（1935-1936年）〉，《民國檔案》，第43期（1996年2月），頁24-26；張勁松，〈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述略〉，《日本研究》，第67期（2001年8月），頁56-63頁。另，從張文的論述可知關東軍特務機關功能與華北地區不同。

²³ 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戰，日中戦争の実相》，頁65-66。

方社會的支配。²⁴

而軍事系統及民間元素間的張力，以及華北軍政支配結構的複雜性，誠如吳應銑的研究取徑，從食糧對策的落實及變化可以具體地呈現。糧政為戰時要政，特務機關是戰時地方行政之中樞。特務機關既是地方事務的決策者，也是基層的日籍職員及在地精英的指導者；它既接受來自指揮鏈上級單位的指示，又負有把這指令落實到地方的責任；它既垂直地與軍事指揮系統相連，又水平地遙控著在地機關及人員，並藉以把握地方社會。簡單來說，特務機關是軍隊指揮鏈向地方延伸的末端，又是地方政治結構及組織接觸國家權力的節點。可以說，考察糧政將有助於闡釋戰時軍事系統與民間元素間的緊張關係。

本文利用日人及協力者的回憶錄，探討作為「日一華」、「文一武」群體紐帶的軍特務機關，如何在糧食問題上展現出他們於整個軍政支配結構中的定位及機能，並兼論中國人的肆應。文章結構如下：首先簡述華北被日軍占領的歷史由來，繼而論述在華北軍事占領下形成的軍政支配結構中，所謂「特務機關」的空間分布及制度定位，再以新鄉特務機關長河野又四郎、山西省運城及該省陸軍特務機關員城野宏，以及身為陸軍「宣撫官」²⁵及祁縣合作社顧問村上政則三人的經歷為主軸，從頭目、內部職員及外圍職員三種角度，縱觀特務機關的組織，分析特務機關的成員如何具體地介入地方事務。最後再引入本地視野，以數名中國人的憶述，探討非常時期協力者在「有所為」與「有所不為」間的自主性及其界限所在。

²⁴ 理論上華北地區的政務指導，應由陸軍省的軍務課掌管，但由於陸軍省內並未設置一元化統轄特務機關的單位，對中國行政的指導權因而更多地由「支那派遣軍」及「北支那方面軍」主理。參見「第1 要旨」，〈特務機關に関する総括的報告（昭和20.11）〉，《陸軍一般史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10423300。

²⁵ 所謂宣撫官，是在華日軍有鑑於部隊無力安撫民眾、掌控秩序，遂於1937年7月創建了宣撫班，其成員享有將校待遇，主要工作是安定社會秩序。他們被灌輸自己是「無武器之戰士」，應當與軍隊處於不同之立場，盡力使中國民眾不為戰禍所困，拉攏在地人共同為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新中國而奮鬥。到了1940年3月，宣撫官與作為御用「國民組織」的新民會合流，大多數的宣撫官也因之流入新民會體系，村上政則是其中之一。參見朱燾，〈日軍需求與鄉保「合作」：溫州樂清淪陷期間鄉村秩序的重構〉，《二十一世紀》，第182期（2002年12月），頁89-101；伊藤正守，〈序にかえて——興晉會員記録の代表作を讃える〉，收入村上政則，《黄土の残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録》，頁3-4、30。

貳、華北地區日軍軍政支配結構的歷史脈絡

「大特務機關長—日本人顧問—協力政權」的軍政指揮鏈條，是華北軍政結構的一大特色。日軍的控制區隨部隊推進，擴張到冀、魯、晉、豫四省，在擴張過程中，各地的陸軍特務機關主導了協力政權的建構及發展。²⁶ 特務機關在扶植協力政權後，再透過配屬到協力政權及其他民間團體的日籍職員，幕後操縱地方事務，實施對地方政治、經濟事務的內面指導。²⁷ 由此形成了由方面軍指揮、特務機關指導、日籍顧問傳達與監視、協力者及其下屬執行的軍政支配格局。特務機關通過此網絡，鞏固對「點」與「線」的控制，並試圖把控制範圍由點、線，擴及至面。²⁸

日籍顧問的積極活動於帝國擴張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正如Louise Young對滿洲國的研究指出，帝國建構及擴展，不只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也是眾多官、商、學共同努力的成果。²⁹ 不過單靠日人，是無法控制廣大的華北占領地的。因此特務機關通過設立治安維持會及協力政權，吸納本地協作者，使之成為軍政支配結構的地方基盤。參照卜正民的研究，協力政權的建構過程的流程如下：特務機關及兵團先派出軍宣撫班，³⁰ 到鄉村組織治安維持會，³¹ 拉

²⁶ 文斐，《我所知道的偽華北政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年），頁3-10。

²⁷ 阿部助哉，《黃砂にまみれて——ある特務機関員の青春》，頁4-5。

²⁸ 「第3 中国方面に於ける特別勤務機関の情況」，〈特務機関に関する総括的報告（昭和20.11）〉，《陸軍一般史料》，Ref.C14010423500。

²⁹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19.

³⁰ 宣撫班本是一批由滿鐵訓練，通中日雙語的日軍軍屬、朝鮮人、東北人組成，後又陸續吸納了一些華北人。宣撫班成員非正式士兵，而是以囑托、軍屬的身分隨軍活動。宣撫班的主要任務為配屬部隊提供戰前輔助及戰後善後之業務，包括情報搜集、宣傳、招撫難民回鄉，強制商戶復業，恢復市場秩序，建立治安維持會及協力政權，推動日語教育等多種使命。到1940-41年，方面軍逐漸建立起常態化的占領體制，此一隨軍活動之宣撫班因之撤銷，成員多加入新民會、協力政權及其他國策會社。參見孫鳳翔，〈山西淪陷區的日偽統治機器及其相互關係〉，收入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5卷第50輯-60輯（太原：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3年），頁741-742；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日本侵晉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85。

³¹ 日軍及宣撫班於各地扶持的治安維持會，原為中國長年戰亂之中，逐漸誕生出來的地方自

攏地方精英，恢復縣政機關。³² 待時機成熟後，再將這些自治單位吸納到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地區性協力政權之中，由此形成由城市到鄉村的行政體系。³³ 日人另外扶植了如新民會般的大眾團體，以動員民眾支持。³⁴ 不過，協力者在服從日人指示的表象下，仍保有一定的自主性，而其無能或自主行動，³⁵ 都擾亂了日人設想的管治計畫及政策目標的落實。³⁶

一、軍政支配結構中特務機關的空間分布及制度定位

1938年10月底，隨著武漢會戰的結束，華北戰事進入長期「治安戰」的階段，日軍的戰略基調轉向減少消耗，確保已占領地區的治安，儘快恢復民生及經濟。³⁷ 軍特務機關的任務，也由最基本的扶植政權、恢復秩序、供應軍需，轉向擴張縣政基礎、把握民心、積極反共。³⁸ 各地特務機關聽命於方面軍司令部及當地駐屯的兵團，指導在地協力政權。而兵團長多專注於「軍務」，特務機關因之主導了地方政務的指導事務。³⁹

治、自救組織。日本通過組建治安維持會，作為恢復治安及經濟問題，尋找協力者的工具，其主要機能是為日本採買、拉伕、輸送、偵探軍情、清查戶口。據時人所述，加入維持會者，固然有以救濟民眾，改善民生為目標，但亦不乏藉此到處鑽營的職業官僚及投機分子。參見袁崇霖，《雪盞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頁12-19；文斐，《我所知道的偽華北政權》，頁155；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戰（1）》，頁78。

³²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戰（1）》，頁56。

³³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日本侵晉實錄》，頁39；邢漢三，《日偽統治河南見聞錄》（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26-28。

³⁴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戰（1）》，頁76-77。

³⁵ 在地部隊對在地民眾多不友善，不論是宣撫班或維持會，所能找到的很多都是原來社會的邊緣人物。原來地方有聲望的士紳精英，或出於民族意識，或純粹因「愛惜羽毛」，多不願響應日軍的號召。參見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戰：日中戦争の実相》，頁68-69。

³⁶ Timothy Brook, "Occupation State Building,"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p. 22-43.

³⁷ 隨著中日戰爭進入長期建設、長期作戰的階段，方面軍的方針亦由軍事作戰，擴及為鞏固日滿華三國的經濟連鎖關係，以確立東亞新秩序。在治安工作方面，應從一時的宣撫，走向民眾的長期獲得。參見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戰：日中戦争の実相》，頁62；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戰（1）》，頁90-102。

³⁸ 高津光平，〈新郷陸軍特務機關について〉，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東京：河南會，1980年），頁147。

³⁹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戰（1）》，頁264。

方面軍特務部曾於1937年11月草擬「北支政務指導計畫案」，明列華北日占區的政務指導，於方面軍司令官的指示下，應由軍特務部主理。指導的力度，以對華北的最高政治機關，亦即當時尚於籌設階段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為最大，對省及特別市次之，對縣及以下的地方行政機關再次之。⁴⁰ 中央政權的樹立，由特務部本部主理，至於地方政府的設立，則須根據統一方針，由各地方特務機關整理當地之治安維持會，結成省、市政府。至於道公署、縣政府的樹立，則無明確說明，只述及應由道、縣的連絡員，以及宣撫班成員作出支援。考慮到不論連絡員、宣撫班實際均須向在地特務機關負責，可以說地方政府，由中央、省、道、到縣，由組建到運作，都由軍特務機關掌理。

方面軍司令部強調特務機關的活動需侷限於「內面指導」的範圍內，不應公開參與政經事務，干涉施政細節，並否定實施直接軍政統治的主張。⁴¹ 但事實上，方面軍始終視華北為東亞新秩序建設、防共而設定的「軍事強度結合地帶」、「特殊地域」；⁴² 堅持軍方有責任進行「肅正建設」，維持對行政機關的「強力掌握」，以推進與國防及生產力擴充的相關施策。⁴³ 因此以日軍及軍特務機關為中心建構支配結構的思想，在華北地區相當程度仍獲得落實。

在整個華北軍政支配結構中，特務機關占有中樞地位，地方政策一般需要經過特務機關長的審議才能付諸實現。⁴⁴ 此既因它們空間上遍及全華北，也由於它在組織內地位緊要。在空間分布上，軍特務機關配屬各師團及獨立旅團司令部，換言之，華北的各大城市均設有軍特務機關。七七事變後，「支那駐屯軍」先於

⁴⁰ 軍特務部，「北支政務指導計畫案」（1937年11月25日），〈支那事变处理（昭和12.7～12.11）〉，《海軍一般史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633200。

⁴¹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戦（1）》，頁46；「第3 中国方面に於ける特別勤務機関の情况」，〈特務機関に関する総括的報告（昭和20.11）〉，《陸軍一般史料》，Ref.C14010423500；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戦（1）》，頁41。

⁴²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戦（1）》，頁264；文斐，《我所知道的偽華北政權》，頁14。

⁴³ 「特務機関長會議に関する件（1）」，〈陸支受大日記（密）第72号（昭和14年自12月1日至12月5日）〉，《陸軍省大日記》，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1608600。

⁴⁴ 文斐，《我所知道的偽華北政權》，頁153-154。

北平、天津、通州三地設軍特務機關，作為政務執行機關，由參謀部統轄。1937年9月4日，「支那駐屯軍」改編為「北支那方面軍」，軍特務機關先後改由方面軍特務部及第四課領導。特務部部長為少將喜多誠一郎，下設總務課、第一課、第二課、第三課，分管交通建設、經濟及產業等。特務部以確立治安、安定後方民心為目標，也是「華北協力政權建設的母體」。到1938年4月，方面軍已於天津、青島、濟南、太原及河南省設有特務機關，總專職人數162名。⁴⁵

1938年11月，以方面軍特務部為首，方面軍已於天津、太原、濟南、彰德、青島、徐州等重要城市設立特務機關及出張所，以指導當地協力政府施政，及把握當地交通、通信、經濟產業的實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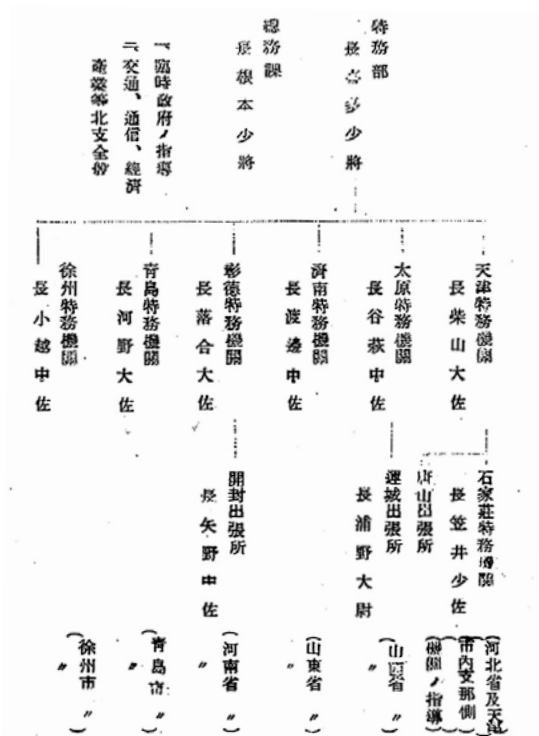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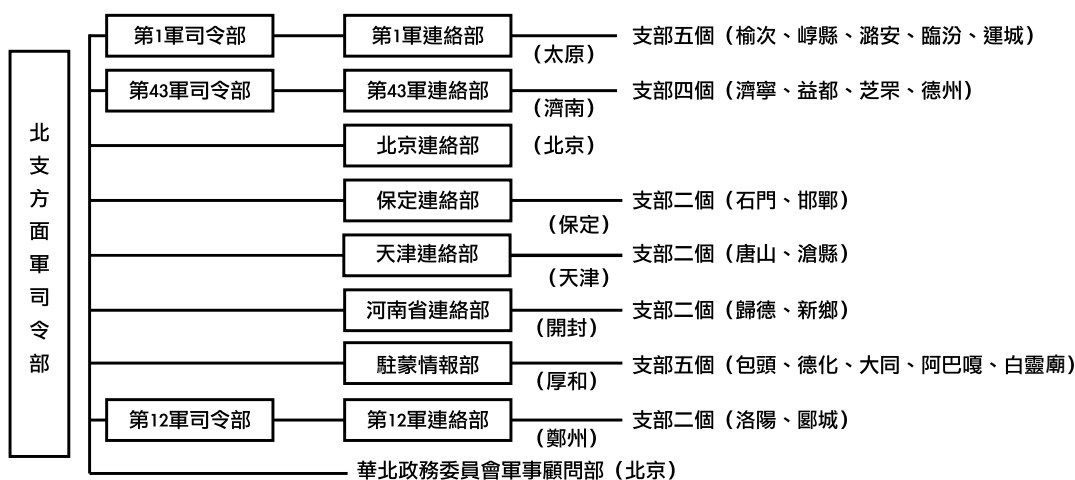
圖1、1938年11月華北地區日本陸軍特務機關機構組織

資料來源：「軍司令官報告資料目錄送付の件（3）」，〈陸支受大日記（密）第8号2/2（昭和14年）〉，《陸軍省大日記》，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0754100。

⁴⁵ 日本防衛廳防禦研修所戰史部編，《北支の治安戦（1）》，頁41-43。

此後這個軍政指導網絡持續擴張。1943年，軍特務機關改稱陸軍連絡部。到戰事末期方面軍及轄下各兵團轄下連絡部已延伸到華北全土，分別為：第一軍連絡部（本部駐太原，支部五所，分駐榆次、崞城、潞安、臨汾、連城）、第四十三軍連絡部（本部駐濟南，支部四所，分駐濟寧、益都、芝罘、德州）、北京連絡部、保定連絡部（有支部兩所，分別於石門及邯鄲）、天津連絡部（支部兩所，分駐唐山、滄縣）、河南省連絡部（本部駐開封，支部兩所，分駐歸德、新鄉）、駐蒙軍情報部（本部駐厚和）、第十二軍連絡部（本部駐鄭州），以及北京的華北政務委員會軍事顧問部（參見表1）。這些連絡部聽命於方面軍及在地兵團，並就作戰、警備事務與附日的省、特別市、縣政府聯絡。⁴⁶

表1、1945年初華北地區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連絡部）機構一覽表



資料來源：「第3 中国方面に於ける特別勤務機関の情況」，〈特務機関に関する総括的報告（昭和20.11）〉，《陸軍一般史料》，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10423500。

⁴⁶ 「第3 中国方面に於ける特別勤務機関の情況」，〈特務機関に関する総括的報告（昭和20.11）〉，《陸軍一般史料》，Ref.C14010423500。

綜觀華北的整個軍政支配結構，當地的最高軍政權威為方面軍，各地特務機關長是方面軍的在地政治參謀，特務機關透過協力政權、新民會、合作社等組織的日籍顧問、輔助官，掌握當地行政的方方面面。⁴⁷ 上述的機構形成了一般意義上的「占領當局」。在此結構中，特務機關發揮著上意下達、擬訂政策、收集民情、促進在地軍、政、經單位溝通的多重機能，是名副其實的地方行政樞紐。⁴⁸

以山西省的陸軍特務機關為例。該機關隸屬於「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它「縱向受華北方面軍司令部特務部領導」，「橫向受山西派遣軍（又稱第一軍）司令部領導」。每個特務機關內設一名特務機關長，下設直屬機關長的政治、經濟、文教、警備、情報、庶務等班，以指導華北的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業務。⁴⁹ 每個班人數在10人以上，設班長及班員，班長多為尉級軍官、預備役軍官或囑托，班員則為囑托及雇員。班長、班員不乏來自日本知名大學的畢業生，以及出身財閥的經理人員。⁵⁰

為了深化對地方的控制，第一軍轄下師團、混成旅團駐紮的據點，又設有特務機關。這些特務機關縱向聽命於山西省陸軍特務機關，橫向接受在地部隊參謀的指令。位處省會的陸軍特務機關，層級一般高於地方的軍特務機關。如山西省特務機關，即負有連絡指導轄下崞縣、陽泉、汾陽、臨汾、運城、潞安等地方特務機關的責任。而這些地方特務機關又負有指導協力政權及其外廓團體如新民會、合作社的責任，並利用這些組織的影響，間接實現日人對地方社會的控制。⁵¹ 如此則形成了另一套凌駕於協力政權的軍政支配機構。若以中國傳統行政區劃為標準，軍特務機關所在的位置，大抵在縣以上，在省或道的層級。一省

⁴⁷ 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日中戦争の実相》，頁65；文斐，《我所知道的偽華北政權》，頁154。

⁴⁸ 高津光平，〈新郷陸軍特務機関について〉，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147。

⁴⁹ 河野又四郎，〈河南時代回想録〉，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2。

⁵⁰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日本侵晉實錄》，頁50-54。

⁵¹ 城野宏，〈山西省之のこと〉，收入興晉會在華業績記錄編集委員會編，《黄土の群像》（東京：興晉會，1983年），頁497。

內設有複數的軍特務機關為常態，⁵² 個別特務機關轄區可能跨越省界。⁵³ 不難想像，省公署及道公署的職權輕易為軍特務機關所架空。以豫北道公署為例，名義上雖有統轄指導轄下各縣的權力，但實際上難以施展管轄內各縣的財權、人事任免權等。⁵⁴

二、華北地區陸軍特務機關的內部組織

前文已闡釋特務機關的空間分布及於軍政支配結構內的定位，後續需要廓清陸軍特務機關的內部組織。第一步是說明特務機關長及專職職員的身分及職能。軍特務機關長是方面軍的政務參謀，掌握占領政策大綱，並指導各地、各層級的協力政權。由於其角色重要，一般是由軍階在中佐或以上的將校擔當。為確保軍特務機關的指示能落實到轄境內各縣，各協力縣公署均常設有縣連絡員。縣連絡員同時作為各特務機關的軍囑托及縣知事的顧問，以「內面指導」行政事務的形式，參與縣內各種事務，控制縣政內最為關鍵的治安、人事、財政等權力。因之日人內部有此說法，軍宣撫官、道縣連絡員是在地方推動政策落實的「無武器之戰士」。⁵⁵

相較於軍特務機關的權限及管轄範圍之廣，其規模和編制並不算大。省級

⁵² 河南日占區內，即曾分別設有彰德特務機關、開封特務機關、新鄉特務機關、歸德特務機關。參見高津光平，〈新鄉陸軍特務機關について〉，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151。

⁵³ 以新鄉陸軍特務機關為例，所管縣分理應為豫北道的二十五個縣（彰德、臨漳、內黃、武安、涉縣、林縣、湯陰、淇縣、汲縣、濬縣、滑縣、新鄉、獲塔、輝縣、延津、封邱、陽武、原武、修武、武陟、清化、沁陽、溫縣、孟縣、濟源）。惟彰德、臨彰、內黃、武安因臨近冀南，被劃歸邯鄲特務機關管轄；而涉縣、林縣因臨近太行根據地，且治安不良，亦未被劃入轄管。但隸河北省的東明、長垣、濮陽等縣之部隊，則與新鄉特務機關保有聯繫。參見高津光平，〈新鄉陸軍特務機關について〉、筒井滿志，〈河南予北道二十五県のこと〉，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147-148、157。

⁵⁴ 高津光平，〈新鄉陸軍特務機關について〉，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148。

⁵⁵ 高津光平，〈新鄉陸軍特務機關について〉，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147。

之特務機關編制約有200至300人。⁵⁶ 支部人數因管轄範圍較少，成員更少。以新鄉軍特務機關為例，機關內部事務職員只有約50名，即使加上外圍人員如長期外派的縣顧問20名，以及新民會、合作社等協助特務機關的日籍職員50名，實則也只有120餘人。⁵⁷

各地軍特務機關的常態業務為「軍」、「政」各部門間的情報交換及指令傳達。特務機關需與在地兵團之參謀部、經理部保持密切聯絡。⁵⁸ 對協力政權，須召開縣顧問會議及主任者會議，以及撰寫政務月報。特務機關每月會召回各地的縣顧問到機關，交代縣政建設進度。機關內各班之主任亦須定時開會，交換各種情報。各縣顧問每月有義務向地方特務機關提交政務月報，特務機關歸納後擇要後再向上級機關提交。機關長亦可能親自走訪轄區各縣現場進行考察指導。⁵⁹

在對特務機關的組織建制作了靜態的說明後，下節利用特務機關長（河野又四郎）、⁶⁰ 特務機關的職員（城野宏），⁶¹ 到外圍成員（村上政則）的歷史記憶，⁶² 以食糧對策為中心，從不同層級探討軍特務機關在軍政支配結構中的動態角色，⁶³ 並作為考察特務機關與地方社會關係的起點（詳見下文）。

⁵⁶ 「第3 中国方面に於ける特別勤務機関の情況」，〈特務機関に関する總括的報告（昭和20.11）〉，《陸軍一般史料》，Ref.C14010423500。

⁵⁷ 高津光平，〈新郷陸軍特務機関について〉，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148。

⁵⁸ 小野久士，〈茫茫五十年の夢〉，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97。

⁵⁹ 高津光平，〈新郷陸軍特務機関について〉，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148。

⁶⁰ 河野又四郎，〈河南時代回想録〉，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54-55。

⁶¹ 城野宏著，崔漢明等譯，〈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城野宏〉，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第1輯3（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238；城野宏，〈山西省之のこと〉，收入興晉會在華業績記錄編集委員會，《黄土の群像》，頁497-502。

⁶² 村上政則，《黄土の殘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録》（東京：文芸社，2004年）。

⁶³ 鑑於特務機關的業務「廣泛多歧」，由治安到思想教育，均有所涉及，要對所有業務進行「縱剖面」式的審視，於篇幅及史料上都不現實。本文因此以極為緊要的「糧食問題」為中心，探討不同層次的機關員處理相關業務之時各自的職責和行動。卜正民曾提到在日人眼中，控制中國最重要的，便是「治安」、「收入」，以及當地經濟的發展。糧食短

叁、日軍特務機關定位與機能：以華北地區的食糧問題與各級特務機關員的因應為中心

為何要以食糧對策作為考察特務機關與地方連結的切入點呢？這是由於糧食是華北的存亡問題。抗戰期間，農業生產受破壞，糧食為各地武裝徵集，戰災加上自然災害頻發，激化通膨。日人為確保對已占領地區的控制，便需把握民心，而在糧食短缺的華北地區，若不能保證糧食供給，即難以安定民心，此即石島紀之對「民以食為天」的戰時詮釋。⁶⁴ 各地的軍特務機關因之都為轄區的食糧安全而苦惱。⁶⁵

一、糧食調劑：以河南特務機關長河野又四郎為例

1941-45年間擔任新鄉特務機關長的河野又四郎憶述在任經歷，坦言大半都與食糧有關，認為自己是處身於一場「食糧戰爭」之中。⁶⁶ 他提到黃河流域土壤

缺問題同時涉及地方治安、地方稅賦及經濟發展，因之可視為華北地區的根本問題。參見 Timothy Brook, "Occupation State Building,"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 40. 吳應銑也提到在糧食短缺，受饑荒衝擊的戰時河南，當局對外要為爭奪糧食爆發戰爭，對內要建立有效的穀物榨取機構以持續戰爭。是以探討糧食的政治，有利於理解華北占領政權中，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獨特張力。參見 Odoric Y. K. Wou, "Food Shortage and Japanese Grain Extraction in Henan,"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p. 175-176.

⁶⁴ 石島紀之，《中国民衆にとっての日中戦争——飢え、社会改革、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研文出版，2014年），頁13-14；另參見 Odoric Y. K. Wou, "Food Shortage and Japanese Grain Extraction in Henan,"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p. 175-176.

⁶⁵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戦（1）》，頁400、444、570。

⁶⁶ 河野又四郎，1897年出生於愛媛縣溫泉郡三津浜町（今之松山市），1919年於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同年12月獲授步兵少尉軍銜，派任至附步兵第十連隊，1921年改附臺灣步兵第二連隊，1922年升任中尉，1924年到東京外國語學校進修一年，1925年駐屯滿洲柳樹屯並到北京留學一年學習中文。先後任職於日屬青島、上海派遣軍司令部、「支那駐屯歩軍」第一連隊等在華組織。1937年3月升任步兵少佐，同年參加七七事變。1938年改屬「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任特務部北京班長。1941年7月調任新鄉特務機關長，翌月升任陸軍

肥沃，本來應該是「農作物的寶庫」，但他赴任時卻發現在旱災、戰亂的衝擊下，當地農田大多已經荒廢。⁶⁷

面對糧食短缺，河野又四郎的解決方法，首先是與他區的特務機關聯絡，調動他處的糧食來滿足本地的糧食需求。各地糧食有無相通本屬常事，但在華北日占區，各地特務機關厲行統制經濟，限制糧食出境，若河野又四郎要開闢「糧道」，首先便需要打通當地特務機關的關節。河野又四郎知道新鄉糧食狀況危急時，即前往打聽附近地區糧食的生產狀況，得知豫東、豫北地區糧食供應緊張，而隴海路東的蘇北地區糧食生產情況則較佳，因此決定親自造訪當地特務機關，期望能獲准把當地的剩餘穀物引入新鄉地區。⁶⁸

河野又四郎選擇到蘇淮一帶調糧，或多或少是由於他與徐州及海州的特務機關長均有淵緣。時任徐州特務機關長江田念中佐與他是陸軍士官學校第三十一期步兵科的同期生，而海州機關長前年曾獲他准許於新鄉地區購糧，河野又四郎或因此相信此行將有收穫。⁶⁹不料與江田念會面時，後者卻以當地食糧統制嚴格為由加以推拒。河野又四郎軟硬兼施一輪後，江田念才鬆口指海州糧食統制情況較為寬鬆，建議河野又四郎轉到海州特務機關。河野又四郎聞言即乘車到海州拜訪當地機關長。

河野又四郎與海州的特務機關長面談時，海州的特務機關長直言前年接收了新鄉方面支援的糧食，本應投桃報李，但當局對小麥統制較為嚴格，只能融通小米、玉米、豆類等雜糧。為了規避統制，雙方商妥由海州地區的縣知事把糧食作為贈禮送豫北道道尹，實際上是河野又四郎派人到海州以遠低於新鄉市價的價錢

中佐。1944年再改任第十二軍連絡部長，1945年5月補步兵第一六三連隊長職務，翌月升任陸軍大佐。中日戰爭結束後，1946年5月復員歸鄉。參見河野又四郎，〈河南時代回想錄〉，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2。

⁶⁷ 河野又四郎，〈河南時代回想錄〉，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5。

⁶⁸ 河野又四郎，〈河南時代回想錄〉，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5-7。

⁶⁹ 房建昌，〈日偽統治時期的徐州〉，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徐州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徐州文史資料》，第20輯（徐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徐州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2000年），頁235。

洽購。如此一來，至少表面上兩地的特務機關仍遵守著「內面指導」中國協力政權的原則，未有直接介入當地政務。這種「不介入」自然是有名無實的，也更反映出，若不理解特務機關長間的互動，則難以理解華北日占地區的政治實態。

地方特務機關要舒緩本地食糧問題，便需要與掌握著穀物、通路及倉存設施的日本商社溝通。日本商社與軍特務機關利益、立場不一，兩者間的互動並非一句「軍人支配」、「商人屈從」所能簡單概括。固然，在戰時華北，「軍一民」、「日一華」關係的雙重不對等，極大地強化了日軍軍官於華北政務上的話語權。不過，面對同樣有財閥支撐、與方面軍關係緊密的商社代表時，特務機關長亦非總是能予取予求的。

新鄉糧食問題困難之際，河野又四郎除設想調購他地糧食，也與當地三菱商事的支店長談判，希望他們能開倉放糧。當時三菱商事作為平衡倉庫的一員，於當地倉庫中積存了約600噸的雜糧，用於操作糧市。操作的原理基本上就是低買高賣，調劑區內有無，從而儘可能地平緩糧食價格的波動。

由於地方的特務機關並沒有直接命令三菱放糧的權限，河野又四郎與該支店長會談時，提到新鄉食糧對策迄今成效不佳，若食糧短缺情況持續，不單經濟不穩、治安也會出大問題，要對方把備用的雜穀直接放出以利管治。支店長不願答應，只說要等待北京方面的指示再作決定。翌日再向河野又四郎轉發了一句來自北京的「不能放出糧食」的電報，並輕輕附上一句「就是這樣」，想著如此便可以打發河野又四郎。

河野又四郎對該名支店長的態度大感憤慨，認為對方是在輕視特務機關的權威。他直斥該名支店長作為三菱商社的代表，沒有恰當地回應特務機關方面的要求，甚至出言恫嚇，稱要動用新鄉縣的警備隊，強行搬出三菱倉庫中的穀物。該名支店長大驚，把在地情形告知上級。

河野又四郎的激烈言論引來三菱方面的反彈，以及上級機構的關切。當時駐開封三十五師團的參謀長來電，埋怨河野又四郎對三菱部員過於無禮；河野又四郎則指自己所作一切，都是為了維持地方的糧價及治安穩定。參謀長方面強調此後與平衡倉庫的交涉將由師團接手，要河野又四郎不要再插手。河野又四郎表面

應承，其後卻繞過師團參謀部，向方面軍參謀長發了一封頗長的電報，述及新鄉地區的食糧及治安狀況。不久後師團方面即再來電，指責河野又四郎不守諾。河野又四郎辯道特務機關長本來就有「適時向方面軍提供情報的義務」，又稱所發電報沒有指陳平衡倉庫的不是，只是就食糧短缺惡化對治安造成的影響對上級提交了「普通的情報」。在後續的意見和對策上，他還是會尊重師團方面的判斷。三十五師團的參謀見事已至此，亦無可奈何。

河野又四郎先斬後奏的策略成功了。隨後方面軍便發來准許開封特務機關放出平衡倉庫儲糧的電報。河野又四郎相當興奮，立即據此要求三菱方面放糧。據河野又四郎事後到北京探聽所得，三十五師團方面即使承諾為新鄉爭取放糧，也只會以書面形式進行，文書製作及折衝需時甚長，也不一定會引起方面軍的重視。確實是河野又四郎越級向方面軍參謀部發出的電報，引起了方面軍的憂慮。方面軍主動向師團詢問治安情況，師團順水推舟予以肯定，方面軍才會要求平衡倉庫放糧。可見河野又四郎要求三菱放糧之所以能成功，是一連串機緣巧合的成果。

特務機關與商社、方面軍、師團間的折衝，反映了華北軍政支配結構的複雜性。在明文規定的制度、組織以外，不同的軍事單位之間，以及軍事及民間組織間各種非常規的互動乃至角力，也形塑著華北的政經秩序。河野又四郎在憶述時，亦認為自己恫嚇三菱支店長，又繞過師團直接誘導方面軍的作法是相當危險的。他提到假如當時的支店長以退為進，大膽地「坐視」河野又四郎派部隊破倉庫門而入，或方面軍在聽取河野又四郎的報告及師團的意見後，仍然不為所動，那自己在當地的威望將大受打擊。自省之餘，河野又四郎也不無得意地認為自己始終採取主動是他成功的理由。

河野又四郎要求三菱方面開倉放糧，獲得了師團及方面軍的支持。華北食糧平衡倉庫方面隨即派人到新鄉與特務機關交涉。河野又四郎因要出席北京召開的特務機關長會議，未能親自參與協議過程。但他提醒部屬，所謂的平衡倉庫實際上就是商人吩咐負責交涉者、驅使他們為華北的統治盡力。他又提到平衡倉庫調撥過來的滿洲國高粱、小米等都是廉價的糧食，因此要部下們儘量壓低購價，最好壓到市價的一半以下，並應以獲得30萬元的盈餘為目標，並期望利用這些盈餘

用於以後的食糧對策上。結果，特務機關以約55元一噸的價格購得小米、高粱，並以時價之一半放出，賺得逾百萬元的收益。

特務機關能以低價放出糧食，從市民角度而言當然是善舉。但特務機關放出糧食的行為，首要目的是為了維穩而非愛民，對此河野又四郎也是有自覺的。他認為受客觀條件所限，特務機關不能養活所有受饑餓所困的民眾，而需按照受救濟民眾與地方治安的相關性，來決定糧食配給的對象。河野又四郎要求特務機關內的政治經濟班按此原則，決定治下各縣的糧食分配方法。⁷⁰

上述的記述，大部分是根據河野又四郎於1970年代寫成的回想錄中歸納得出的。不難想像其中有遺漏、粉飾的成分。不過，這些記述仍有助於豐富我們對於軍特務機關長職責及活動的認識。最令人注目的是，河野又四郎的記述把軍特務機關的活動「去絕對化」了。過去學界對特務機關的說明，往往把它視為理所當然的地方事務的決策者。確實，戰時日本軍人地位崇高，若從協力者及一般百姓的角度出發，特務機關長既屬高級軍官，特務機關本身亦背靠在地師團，其在地權威即使不是絕對的，又可說是與「土皇帝」相差無幾了。

但從河野又四郎的回想錄，看到的是特務機關權力雖大，卻決非是絕對的。特務機關既為方面軍派駐到地方的政務參謀，在制度上給予指揮縣連絡員、日籍顧問、協力政權的權力，但這個權力是受到方面軍參謀部、在地師團參謀部、乃至其他商業團體的制約。面對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河野又四郎需要尋求其他軍特務機關的協助。面對平衡倉庫不願放糧的情況時，河野又四郎亦不能直接以武力獲得所需糧穀，而需通過方面軍、師團來向平衡倉庫及三菱商社施壓。方面軍作為一個組織，在華北地區的權威無疑是壓倒性，但特務機關長作為一個個體，以及特務機關作為一個單位的話語權，在指揮鏈內外的位置仍然是受到多重制約的。除了受到上級或同級單位的掣肘，⁷¹ 高級的商社職員亦不會輕易服膺於一名陸軍佐級人員的權威之下。至少在河野又四郎眼中，和軍隊內外要員的聯絡、協

⁷⁰ 河野又四郎，〈河南時代回想錄〉，收入河南會編，《黄河の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頁6-17。

⁷¹ 在糧食短缺之際，臨汾特務機關曾聯同憲兵到汾陽特務機關管轄的霍縣強奪當地商人的小麥。此證明一地之特務機關是有可能設法謀奪其他特務機關轄區內儲糧的。參見阿部助哉，《黄砂にまみれて——ある特務機関員の青春》，頁134-141。

調、博弈，是他日常業務的重要部分。

二、統治經濟：以山西特務機關員城野宏為例

若說特務機關長的角色，更多是在大方向上作出關鍵決策指示，以及協調機關對外關係，那特務機關內的專任職員，則參與到更多的地方實務，如作出提案，跟進政策落實進度及情況等。1941-43年間，先後任職於運城及山西省特務機關政治班的城野宏，對在職時的主要活動及成績留下了詳細的紀錄，為後世研究者理解特務機關員的職責及活動，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內部視野。⁷²

學界對於城野宏的認識，一般圍繞著山西殘留日本軍隊，對他戰時活動的認識並不深入。1941年6月，原屬於第一軍轄下三十七師團輜重兵三十七聯隊的陸軍少尉城野宏，被第一軍調到運城特務機關的政治班。同年12月調回山西省（太原）陸軍特務機關，短暫加入總務課後，仍於政治課中工作，直至1943年9月被調回日本。同年11月，他再以第一軍囑托的身分擔當山西省政府顧問室顧問輔助官的職務，直到日本投降。⁷³

城野宏在1941年7月至11月擔任運城特務機關少尉政治班長時，主要參與的業務有三：一是審理預算及參與決定政治方針；二是確保資源攫取的效率；三是地方情報的彙集及掌握。

⁷² 城野宏，1914年8月31日生，原籍日本熊本，出生於長崎，1938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畢業，同年12月應徵入伍，任東京第一師團輜重兵第一聯隊留守隊二等兵，同月來華至龍江省泰安受新兵教育。1939年11月返日入久留米陸軍預備士兵學校，1940年5月畢業後任見習士官。1940年12月以陸軍少尉調至北支派遣軍第一軍司令部，任第三十七師團輜重兵第三十七聯隊附。1941年6月派至運城特務機關，8月任班長，11月以太原第一軍司令部參謀部附少尉，服務於第二科政治課，12月調山西省陸軍特務機關總務課，1942年3月調回太原服務。1943年3月山西陸軍特務機關改稱太原陸軍連絡部，仍在該部政治班任職，9月調回日本熊本第六師團輜重兵第六聯隊，11月再次抵華於太原任第一軍囑托，1944年2月任山西省政府第一顧問輔助官，直到日本投降。參見城野宏著，崔漢明等譯，〈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城野宏〉，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第1輯3，頁3-4。

⁷³ 城野宏著，崔漢明等譯，〈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城野宏〉，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第1輯3，頁3-4。

其一，城野宏任職於運城及山西省陸軍特務機關政治班（課）時，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審議協力政權的財政預算。按照當時方面軍及第一軍的施政方針，城野宏遵循「治安第一主義」並尋求實現健全財政，減少浪費。任職運城特務機關時，城野宏為了強化在地保安隊，曾召集河東道各縣的連絡員開會，宣布增加次年度各縣的徵稅量及提高軍事支出。城野宏為此與同機關內之財政班長、警政班長交涉，期望特務機關能撥出額外的補助費。任職山西省特務機關期間，城野宏曾到北京參與方面軍司令部第四科召開的預算編成會議，按照既定方針修改預算，提高地方徵稅額，並將預算交予政治課長、特務機關長審視，經第一軍司令官批核後，再以此指導省公署編成新年度預算。城野宏認為該次增稅激化了1944年春高平縣的饑荒。

其二，除了政治課的本職工作之外，城野宏也需與特務機關的其他部門協調，以確保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城野宏憶述在運城特務機關工作時，曾與機關長、經濟班、文化班商討如何於河東道內落實「統制經濟」。事緣為第一軍與山西省陸軍特務機關要求運城的特務機關強化對轄區內經濟的控制。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為了協助日軍徵購重要農產物資，各部門需加強協作，一方面禁止其他商人參與，另一方面對火柴、棉布、石油等日用物資實行配給制，以確保合作社能依照「公定收購價格」統購農產品。此議上交三十七師團參謀長後獲批准，由師團按照議案，指示合作社以低於市價一至兩成的公定價格購糧、棉產品，並限制工業品的流通。⁷⁴

城野宏任職於山西省特務機關政治課期間，除了參與政策規劃外，亦多次到農村視察政策執行的實況。1942年時，華北的協力政權正在推動第四次及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剿共自衛」、「勤儉增產」、農產品的確保，以及抑制物價等都是運動的重點目標。⁷⁵ 10月，城野宏作為政治課的一員，奉太原機關長石野芳男少將的命令，需到地方視察運動推進的情況，再向政治課長米花宇太尚中佐報告。⁷⁶ 城野宏到汾陽、祁縣視察後，認為汾陽縣的模範村工作只是粉飾表面，對

⁷⁴ 城野宏著，崔漢明等譯，〈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城野宏〉，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第1輯3，頁7-8、17。

⁷⁵ 日本防衛廳防禦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戰（1）》，頁576-577。

⁷⁶ 塚村英一，〈華北合作社運動の概況 亡き同志へ青春の一節〉，收入興晉會在華業績

反共毫無幫助，建議撤銷模範村工作，把經費撥入縣保安團及村自衛團中。米花宇太尚接納他的意見，並向臨汾特務機關發出指示，當地的模範村工作就被取消了。11月，他再次奉命隨同山西省保安副司令蔡雄飛考察上黨道縣政及治安強化執行情況，此後提拔了一些表現出色的地方官員。⁷⁷

其三，城野宏需撰寫所屬機關的月報，供機關長及上級單位參考。運城特務機關有義務每月向省特務機關提交轄區內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情報。城野宏在任期間也因此需要從各縣連絡員提交的月報中歸納重要的財政、治安、要人的活動情形，主力撰寫與「政治」相關的部分。⁷⁸ 任職山西省陸軍特務機關政治課成員時，城野宏主要撰寫與政治、財政及新民會有關的報告。他蒐集、整理山西省政府顧問室月報、省府文件、各地特務機關的月報，以及新民會顧問的報告，編入省特務機關月報之中，並提交該月報供方面軍司令部參考。⁷⁹

情報收集之外，城野宏也亦積極參與政治教育、輿論宣傳的工作。1942年5月，第一軍參謀長花谷正中將發表講話，提倡中國新民會要仿效滿洲國的協和會，以會為中心結合協力政權，建立協力政權、新民會、合作社三位一體構成的支配結構。花谷正又提議以合作社作為「國民經濟組織，壟斷民眾消費供給」的方針。城野宏把這些論調編成小冊子，分發予軍政幹部，作為日後指導協力政權的參考。此外他又多次以投稿雜誌或公開演講的形式，向日籍職員、居留民會等宣傳統制經濟，強調個人為整體利益犧牲的必要性。⁸⁰

城野宏對自身工作經驗的記述，有助於我們重現特務機關專任職員的業務及工作流程。在城野宏筆下的日常工作，實與一般官僚相差無幾：參加會議、撰寫

記錄編集委員會編，《黃土の群像》，頁536；外山操、森松俊夫編，《帝國陸軍編制總覽》，第2卷（東京：芙蓉書房，1993年），頁976。

⁷⁷ 城野宏著，崔漢明等譯，〈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城野宏〉，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第1輯3，頁14-15。

⁷⁸ 城野宏著，崔漢明等譯，〈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城野宏〉，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第1輯3，頁7-8。

⁷⁹ 城野宏著，崔漢明等譯，〈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城野宏〉，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第1輯3，頁14。

⁸⁰ 城野宏著，崔漢明等譯，〈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城野宏〉，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第1輯3，頁13-14、17。

報告、提交建議書、審查預算等。他們亦需偶爾出差，或往上級單位接收指示，或到轄下地區視察地方情勢。城野宏的工作經驗顯示特務機關職員擁有提案權，也能一定程度地影響協力政權的人事安排。不過當涉及根本大政時，有關提案仍需先上交特務機關長及師團的高級參謀審視後，才能往下發予協力政權的行政機關來執行。如果是一般的例行事務，特務機關員則可直接召開會議，向參加的各縣協力政權的官員及日籍顧問傳達指示。

三、糧食攫取：以祁縣合作社顧問村上政則為例

軍特務機關作為地區行政的指導機關，是地方重要事務的實際主腦。軍特務機關長掌有決策、調度、協調各方利益的責任。至於特務機關的專任職員，則需就其職務，審查地方政府機關提交的預算，監查政策於地方落實的情況，彙整本地情報，並向上級提交自己見解及方案。他們雖偶而到地方巡視，但主力從事的仍是參謀、監察、後勤性質的工作。真正常態性地指導協力政權，確保政策落實的，實為任職於省公署、道公署、縣公署、新民會、合作社，以及其他組織的日籍顧問、連絡官、輔助官及軍囑托。這些日籍職員作為特務機關的外圍成員，身處於軍隊指揮鏈的末端，既是第一線的政策規劃者，也是特務機關與協力政權、地方社會互動的節點。他們同時承受著來自上方的壓力及地方環境的制約。審視這批基層日籍成員的在地工作經驗及感受，有助於梳理特務機關與它的在地代理人的互動。

外圍成員的視野，亦有助於揭示軍方成員所未有觸及的特務機關的暴力本質。河野又四郎及城野宏憶述業務內容，多強調特務機關系統的官僚性格，而未細寫其利用暴力來獲得服從及資源的面向。兩位都屬於擁有特權的軍人群體，回憶任職於特務機關的經歷上，多記參加會議、案牘工作、巡視地方、到外地出差等事務。他們的記述，有助於把特務機關較鮮為人知的一面呈現出來，但絕不能因而忽略特務機構，乃至整個軍政支配結構本身，都是建基於日人對本地社會及在地人士的顯性及隱性的暴力壓迫之上。在這一點，軍政支配與戰前、戰後中國建立的政權，又存有根本的差異。

以下就軍宣撫官村上政則⁸¹擔任祁縣（榆次特務機關轄區內）合作社顧問的經歷，探討基層人員及地方社會是如何「落實」特務機關的糧食對策。⁸²同樣是面對糧食短缺的問題，當河野又四郎自詡成功為當地民眾調來外糧之際，於基層從事穀物徵購，親眼目睹百姓利益被犧牲的合作社顧問村上政則的眼中，體會到的是軍政支配結構的掠奪性及寄生性。

1944年村上政則走馬上任祁縣合作社顧問時，華北各地區已實施糧食的責任供出制。⁸³省公署分配農產品的責任徵購額予各縣，各縣署再攤分子轄下各村落。地方的軍特務機關為了徵購足夠的穀物，動員在地縣公署、新民會、合作社、由宣傳到強奪，以各種方式推進穀物的收買工作。⁸⁴在這樣的環境下，協助特務機關徵購糧食，就成為了地方官員的主要任務。⁸⁵

村上政則上任後立即判斷祁縣的負擔是過高的，榆次特務機關要求祁縣合作社提交麥類6,000噸、雜糧4,900噸及棉花1,900擔（一擔100斤）。村上政則舉鄰近之太谷縣為例，指太谷縣每畝田只需上交38斤的農產品，祁縣卻需提供60斤，

⁸¹ 村上政則，1915年生於宮崎縣西都市，1932年於西都市立妻中學校畢業。1939年作為「北支派遣軍」的軍宣撫官被派到山西省特務機關，此後因應宣撫班與新民會的合流，以及新民會與合作社的分立，先後擔任軍宣撫官、新民會長子縣事務局和晉城縣顧問、山西省大政翼贊會組織部、祁縣合作社顧問等職務。參見村上政則，《黃土の殘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錄》，頁27、77、133、153、318。

⁸² 華北地區的新民會成立之初，會內領袖視組織合作社為其主要業務之一。新民會通過合作社為民眾提供貸款及可負擔的消費品，公平地處理其生產物，以此為掌握民心的工具，實現思想、推動政治動員及經濟革新。不過，隨著戰事緊張，合作社逐漸為日本軍方及特務機關異化，成為控制農村社會、掠奪農產品、實現經濟封鎖的重要工具。1941年末，華北合作社事業總會創立，接手新民會的合作社業務，合作社系統就此成為協力政權行政機關的一部分。參見村上政則，《黃土の殘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錄》，頁77、133、156；塚村英一，〈華北合作社運動の概況 亡き同志へ青春の一節〉，收入興晉會在華業績記錄編集委員會編，《黃土の群像》，頁533-537。

⁸³ Odoric Y. K. Wou, "Food Shortage and Japanese Grain Extraction in Henan,"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 188.

⁸⁴ 〈戦ふ合作社 記者團現地視察報告座談會〉，《華北合作》，第10卷第1期（1944年），頁73-74。

⁸⁵ 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日中戦争の実相》，頁166。

供給的比例較太谷縣高出四成以上。⁸⁶ 政府設定的收購目標過高，使該縣成為特務機關轄區內穀物徵購成績最差的縣分。榆次地區各縣分穀物徵購成績普遍在五成以上，祁縣只有不足三成。⁸⁷

村上政則認為特務機關高估祁縣提供穀物的餘力，是徵購額度難以完成的主因。據他了解，不限於榆次，華北各地的特務機關多未能掌握所轄縣農業生產的基本情報，如總耕地面積、人均產出等。特務機關既無從較準確地得知各縣的農產量，他們所提出的各縣農產物徵購份額亦多不合理。不過，特務機關卻能基於統帥權，發出名為「食糧收買」的作戰命令，令這些不合理的推算數字成為基層官僚需拚命實現的收購指標。一般流程是特務機關召開會議，向縣長及村代表們交代徵購數量，安排各村攤分數量，規定穀物徵購量、購價、納入日期等，基本上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⁸⁸

村上政則於榆次地區內穀物徵購成績最壞的縣分任職，在特務機關召開的食糧督勵供給會議上自然備受關切。這種供給會議是由特務機關召開的會議，主要邀請在地的協力縣長、日人顧問，向特務機關長及經濟班長報告徵購進度及督勵方法，再由特務機關長給予指導。縣長、顧問們都對這種場合都相當畏懼。事實上，祁縣的曹姓縣長於會議之前，便曾登門向村上政則哭訴其處境，哀求他在會議上盡量為祁縣說項。⁸⁹

在一次督勵會議中，村上政則聲稱祁縣已發動總力收購糧食，但由於「過重的供出責任」，仍未能完成徵購目標。榆次特務機關長「多田大佐」立即打斷他的發言，斥責他工作不夠努力，卻以地方負擔過重作為失敗的藉口。⁹⁰ 多田強調

⁸⁶ 村上政則，《黃土の残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録》，頁161-162。

⁸⁷ 村上政則，《黃土の残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録》，頁156-157。

⁸⁸ 村上政則，《黃土の残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録》，頁116。

⁸⁹ 村上政則，《黃土の残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録》，頁158。

⁹⁰ 榆次特務機關長的確切身分存疑。村上政則稱其為「多田大佐」，然翻查《陸海軍将官人事総覧 陸軍篇》（東京：芙蓉書房，1993年據1981年版第8刷），並未見多田姓氏的陸軍軍官於山西省擔任特務機關長的紀錄。參考《帝国陸軍編制総覧》，對於太原、潞安、運城、臨汾、陽泉、雁門（崞縣）特務機關長均有紀錄，唯獨不見榆次特務機關的相關資料。駐榆次之第六十二師團及其轄下旅團、獨立步兵大隊，亦無多田姓氏的將佐，此處村上或記憶有誤，或故意使用假名。考查「多田」的發音（ただ或 Tada）及其他線索，村

在此「祖國日本之重大時局」，正需要屬下「粉身碎骨」，把不可能的徵購量化為可能。村上政則反駁稱祁縣徵購成績較差，或有努力不足的成分，但主因是因該縣所獲分配的責任供出量太高，又指徵購下去，恐怕會有大量縣民餓死。

對於村上政則的反駁，多田接下來的反應，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現出日本軍人對於在地百姓、對於資源動員的態度。他立刻把案上一陶製菸灰缸大力朝村上政則擲去，怒吼道：「你究竟在說甚麼啊？餓死他們啊！……區區中國人，三十萬也好，五十萬人也罷，就讓他們餓死又如何？」此後他又說，若不以燒村、殺人來恫嚇當地農民，他們是不會乖乖低價賣出農產品的；更指控村上政則為當地人說話，是被地方精英利用了，質疑他是否抱有「反軍思想」。

村上政則回想當時的情境，仍覺膽戰心驚。在戰時華北，軍特務機關及高級軍官享有名副其實的「生殺大權」。村上政則膽敢質疑上級的判斷，只要有軍人懷疑他有「反軍思想」，向憲兵隊通報，那麼村上政則的前途乃至人身安全，就會立即受到威脅。雖強烈不安，但村上政則還是認為這種對農民一味榨取的言論，無疑會激起在地協力者的敵意及反抗心。

所謂的糧食徵購過程是相當血腥的。會議後兩天，榆次特務機關的經濟班長就奉命帶領由數名士官、士兵組成的「強制收買督勵班」行進到祁縣徵購成績最差的村落，準備以武力進行強制收買。村上政則在內的縣公署、新民會、合作社職員也被動員起來。在村公所的廣場，祁縣縣長先進行了演說，大意是指責該村徵購成績不佳，因之已不能期望他們會自主賣糧；又提及這次特務機關遣人監督，要求村民協力提供足額的糧食，否則士兵將強行入屋搜糧。為了威脅藏糧的農民，督勵班的士兵割下了村長及數名村民的耳朵，帶兵的經濟班長甚至語帶挑釁地提議不妨放火或殺人來示威，以確保農民會交出糧食，又警告村上政則以後要謹言慎行。

田描述的特務機關長，有可能是曾任雁門特務機關長的恩田忠錄中佐（恩田日語可發おだ或Oda），或於太原周邊從事警備任務的谷藤長英（谷藤可發たにとう或Tanitou）。但由於缺乏確切證據，此處仍用某或該名特務機關長。參見福川秀樹編著，《日本陸軍將官辭典》（東京：芙蓉書房，2001年），頁462；外山操、森松俊夫編，《帝國陸軍編制總覽》，第2卷，頁976-986。

村上政則堅信要避免類似的慘劇再發生，便需要更有力的證據來證明祁縣的責任徵購量確實是過高的。為此，他在祁縣合作社編成「食糧收買督勵班」及「生產實態調查班」，派人員到農村巡視，梳理各村落的耕作面積、作物種類，畝產量等基本資料。由於當時祁縣治安不佳，日人到農村活動均需要保安隊護送，調查過程並不輕鬆，經歷兩個月的工作，才總算完成了「祁縣內食糧及棉花實態生產調查報告書」。村上政則後來利用這份調查報告，駁倒了棉花組合成員要求維持棉花收量的主張。而榆次特務機關此後出於種種理由，也決定下調祁縣的農產品徵購量。⁹¹

村上政則聲稱自己作為宣撫官，作為日軍「無武器的戰士」，本應為維護民眾的福祉，為日本把握中國民心而活動的。但如城野宏所言，合作社實際僅為日軍視為控制農村及農產品的組織工具。村上政則被調入合作社系統時，也發現自己處於特務機關與中國農民間的夾縫，難以自處。若按照特務機關的指令徵購，農民必定受苦，但若同情農民，則完成不了日軍賦予的使命。村上政則因之慨嘆道在巨大的戰爭之下，個人微小的感情、良心與抵抗並沒有太大的意義。⁹² 村上政則的感想，反映了一名良心未泯的日籍職員，在「奉公」時內心的道德掙扎。

更重要的是，村上政則的記述，表現出特務機關運作的根柢，亦即河野又四郎及城野宏均未多提及的關鍵面向：它對於地方官員、日籍職員，及至一般平民，或隱性或顯性的暴力壓迫。這種暴力或表現為軍人、憲兵對日華官員施加的語言、肉體傷害及相關恐嚇，或表現於通過作戰命令而實現的行政暴力。即使是日籍職員，面對行政及肉體暴力的威脅，絕大多數亦只能屈從。至於中國民眾的利益，在軍人眼中更是不值一提了。為了提高農產品徵購量，犧牲在地民眾的利益是理所當然的，即使要人傷人，甚至殺人放火，也是可接受的。特務機關上下對於文官的輕視，對於中國人的鄙視，反映的是華北軍政結構中，暴力與權力環境相扣，相互滋長而衍生出的獨特文武及民族關係。

而相對於特務機關對地方官員壓倒性的權威，它對於本地社會卻是相當無知

⁹¹ 村上政則，《黃土の殘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録》，頁161-178。

⁹² 村上政則，《黃土の殘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録》，頁116。

的。即便是最基礎的農業資料，特務機關也未能把握。這種對地方實態的無知，導致日人規劃糧食徵購政策時，根本無法妥善地分配徵糧數字及其他稅務負擔。與此同時，特務機關卻能基於無事實根據的收穫「推算」，發出「食糧作戰」命令，要求協力者、日人顧問收購超出當地經濟承受範圍數量的農產品。這情況反映了協力政權未能滲透農村，理解地方實態的事實。⁹³ 而這種對基層農村的不理解和疏離，又使日軍不論於資源動員或反共活動上，都始終處於被動的位置。

最後，就是特務機關與協力政權間互相依存的關係。在省、道的層面，特務機關系統，由特務機關長到外圍的協力政權的連絡員、顧問，以及新民會、合作社的職員，構成了一個由日人主導的軍政架構。但到了縣以下的農村基層，這些由日籍職員構成的軍政機構的末端，由於人數不足，就難以發揮持續控制本地事務的效果了。在徵糧一事上，出動「強制督勵班」以暴力催徵乍看有效，但特務機關的人力資源畢竟有限。要動員在地資源，多數情況上仍要依賴日籍顧問及協力者的配合。軍政支配結構要運作順暢，日人與協力者、軍人與民間人士，各方的協作是缺一不可。村上政則及其他日籍職員的經歷證明，在一些情況下，他們是有能力修正方面軍的指令，為改善民生、農業增產作出貢獻的。⁹⁴ 但在軍人獨大且濫用暴力的前提下，他們的貢獻也註定是有限的。在暴虐的軍政支配下，農村經濟極度疲敝，更多的農民倒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華北占領地的治安也就更難維持了。⁹⁵

肆、中國人民的因應：不對等關係下的 「利用」與「被利用」

留在日軍占領地區的民眾，必然地受著日本軍政支配結構的宰制，但並不意味著他們於此結構完全喪失了自主性。卜正民分析占領社會的實態時，即點出日

⁹³ 陳耀煌，《中國農村的副業、市場與共產革命，1900-196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年），頁130-133。

⁹⁴ 阿部助哉，《黃砂にまみれて——ある特務機関員の青春》，頁155-170、218-233。

⁹⁵ 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日中戦争の実相》，頁167。

人「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此一基本的事實。再強大的征服者，也需要被征服者提供引導及情報。日人不信任當地人，卻不得不驅使他們之中的協力者，動用他們的人際網絡來維持其在華北的軍政統治。在軍特務機關眼中，協力者是「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工具。⁹⁶而在武力威懾下本地人的服從及協力，也是軍事占領得以維持的基本前提。但本地人的「協力」及「服從」的內涵，實則是相當豐富的。⁹⁷有的人全心投入，藉此升官發財；有的虛應故事，以應付日軍的威逼；有的以協力謀生，安分守己；有的在能力範圍內，秘密抗日。⁹⁸在「軍一政」、「日一華」的二重不對等關係之中，日人及協力者之間，也是在利用著彼此，協力關係中亦存有張力。占領者與協力者共同地塑造了民眾的戰時日常生活。

一、中國百姓對日本軍政支配結構的感想

一般中國老百姓對日軍的軍政支配結構並無認識，主要是由於他們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觸到的，絕大多數都是協力者，而非日人。⁹⁹更甚者，一般農民可能連協力政權也接觸不多。中國一直有「皇權不下鄉」的說法，國家政權對地方社會，特別是農村地帶的影響力是有限的。¹⁰⁰日人透過協力政權、商會等組織來遙控地方事務，群眾日常生活所能接觸到的人物，充其量就是區長、鄉長，或者是本地出身的村長、保甲長等。他們對於協力政權或許尚有印象，但對於再上一層的軍特務機關、日人顧問，了解便相當有限了。

群眾個體對於占領社會整體的觀感，也會因時空背景、所屬階級職業等而有相當之差異。一般認為，日軍治下華北居民的生活是朝不保夕、心懷怨懟的，但

⁹⁶ 徐暢，《戰爭·災荒·瘟疫——抗戰時期魯西冀南地區歷史管窺》（濟南：齊魯書社，2020年），頁15。

⁹⁷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pp. 10-12, 233.

⁹⁸ 趙隱儂，〈梁園淪陷前後〉，收入毛德富主編，《百年記憶：河南文史資料大系》，社會生活卷（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407-408。

⁹⁹ 徐暢，《戰爭·災荒·瘟疫——抗戰時期魯西冀南地區歷史管窺》，頁154-155。

¹⁰⁰ 陳耀煌，《中國農村的副業、市場與共產革命，1900-1965》，頁134-136。

亦有些人如歷史學者劉鳳翰般持有異見。劉年少時於日占華北保定一帶長大，據他所言，當地獲保衛團護持，日軍暴行較為罕見，人民生活水平較大後方為高，青年可到京津接受高等教育。他又指出附近農村的中上階層，不少為了逃避「共產黨之抽丁、捐獻、清算、鬥爭，而托庇於附近日偽所治城市」。¹⁰¹

在農村地區，農民對於日人軍政支配的感受也是難以一概而論的。一般相信，日人「竭澤而漁」，加重對農村地區的控制及掠奪，引發了農民的強烈反彈。中共通過派人於日占區的農村組織奪糧戰、護糧戰，既收穫了穀物，也為以後在農村發展打下了基礎。¹⁰² 不過，卜正民也觀察到，河南的一些農民已習於被不同的地方派系所統治，對於新舊官員的交替亦司空見慣，掌權者是國民黨、日人抑或協力政權，於他們亦無太大差異。¹⁰³ 在魯西、冀南地區，一些農民對協力軍隊印象不佳，認為他們對百姓要錢要糧，對日軍、八路軍則無力反抗很「孬」，反而對於不搶劫、不打人的日軍印象則較佳。¹⁰⁴

可以說，由於民眾日常生活所能接觸的，多是對日協力者，甚至協力者們的代理人，對於操縱協力政權的軍政支配，認識極淺。而且這種認識，還會因著個人的生活經驗、眼界、所屬的時空、階層、群體而有千差萬別，對於理解軍政結構的「在地化」實態，或許沒有太大的幫助。

二、協力者對日人食糧對策的因應

相較之下，協力的官員、商人們，處於與日人接觸的第一線，又直接參與政策落實的過程。他們留下的紀錄，對於考察本地人對於日人食糧政策的因應，以及日人、中國人如何共同塑造戰時社會的日常生活，更有價值。在高壓的戰時環境下，協力者們擺出服從的姿態，在實際行事則遊走於「把事作盡」、「把事作

¹⁰¹ 劉鳳翰，《抗日戰史論集—紀念抗戰五十周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頁530-531。

¹⁰² 邢漢三，《日偽統治河南見聞錄》，頁227-230。

¹⁰³ Timothy Brook, "Occupation State Building," in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p. 40.

¹⁰⁴ 徐暢，《戰爭·災荒·瘟疫——抗戰時期魯西冀南地區歷史管窺》，頁150-153。

完」、「把事作好」、「作好事」、「故意壞事」之間的灰色地帶。日人的種種食糧對策，少有完全在地貫徹，而是會被創造性地解讀、轉化、變形，繼而才真實影響到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體驗。協力者們對於各種對策的因應，即體現了在此日人主導的軍政結構中，在地者的自主性。

華北地區的食糧對策，在城、鄉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對策的差異也決定了協力者自主性的高低。在都市地區，日人的食糧統制的主要目標仍是調解食糧短缺、壓抑糧價；¹⁰⁵ 在農村地帶，則以恢復農村生產、攫取更多農產資源為根本目的。微妙地，華北都市居民與日人，同樣作為華北農村的「寄食者」，兩者的立場是較為接近的；對農村，日人主要目的在控制與榨取，與農民的利益衝突更為尖銳。日人食糧對策在城鄉重點不一樣，協力者們的因應及所能發揮的「作用」也自然不同。具體而言，在城市地區，協力者與日人之間既有張力，亦有協力的空間。協力者在被日人利用的前提上，協力者亦可能利用日人。但在農村地區，協力者們敷衍應付的空間更為有限。

在都市地帶，協力政權的高層成員雖無力左右政策方針，但他們若「把事作好」，已能蔭庇民眾。以王蔭泰為例，他於1943年到1945年間擔任華北政務委員會農務總署督辦、物資物價處理委員會委員、食糧公社理事長等要職。在漢奸審訊的自白書中，王提到自己在位時，對「敵偽欺壓民眾之情事」均從嚴辦理，而對物資搜刮及統制，基於「維護我民眾生存起見始終抗爭」。他舉例說明在任職食糧公社理事長（1944年5月到翌年2月）成功地從地方政府及平衡倉庫中，購換得一部分糧食，每月用於配給中國公務員及平、津、青三個特別市的居民，並強調「日方別無所得」、「上了我們的當」。¹⁰⁶ 不論日人是不是真的「別無所得」，至少特別市的市民確實是獲得了額外的廉價糧食。

在日人眼中，都市的豪商士紳都是日人用於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而地方精英或被迫為日人利用，或樂於利用日人的資源，在保身之餘作些份外的「好事」。這種「在敵人夾縫中工作」內在的矛盾性，可從劉玉書供詞中得到相當的

¹⁰⁵ 中村隆英，《戰時日本の華北經濟支配》，頁347-348。

¹⁰⁶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頁928-932。

體現。劉玉書曾任天津市治安維持會委員、北京特別市市長、食糧管理局局長等要職，強調自己「落水」期間，「未曾作過利敵禍國殃民之事」，一心「保存國家元氣」、「解除現時人民痛苦」。他在任職北京市長時，於食糧青黃不接時期，號召地方團體，搜購市內餘糧，杜絕富戶囤購，又把雜穀製成「混合麵」，用於賑濟貧民。不少戰時居住於北京的居民於漢奸審判時為劉辯護，證明劉在任期間，為北京的教育、慈善、宗教機構等籌配糧食，賑濟貧民。¹⁰⁷ 但需留意的是，劉的種種善舉，也是由於日人的默許才能實現的。換言之，當日人與在地人員利益無衝突，甚至相合之際，協力者就能利用他的地位、職權，為市民爭取多一些利益。

在「多作些事」之外，協力者也能利用日人不熟識本地情況的弱點，「少作些事」及「故意壞事」。華北軍政支配結構的最大弊病之一，在於日人對地方社會的不了解。以日籍職員的數量規模，亦遠不足以掌握地方事務的所有重要關節。¹⁰⁸ 這便為本地協力者虛應故事、暗中破壞管治創造了條件。舉例而言，開封市商會是日人用於統制經濟、徵購物資的代理人。商會代表們卻經常用拖延、請客送禮、吃喝拉攏等方式，阻礙日人政策的落實，又或者上交一些次等物資來交差。¹⁰⁹ 1942年開封特務機關推動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時，即要求各地方政府組成河南省經濟封鎖督導委員會，加強對中共的經濟封鎖，然派到商邱、新鄉等縣市的督導員中，有部分反而利用職權秘密掩護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暗助他們突破封鎖獲得物資。¹¹⁰ 在廣大的華北淪陷區，軍特務機關連帶其外圍人員的監察能力終究是有限的。基層成員行動時因而可以虛晃一招，甚至反過來暗助抗日勢力突破經濟封鎖。

¹⁰⁷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頁1279-1284。

¹⁰⁸ 據推算，整個河南淪陷區共設有20餘個不同類型的日本機構，但日人數目於最高峰（1942年）時期也不足4,000人，於軍特務機關及協力政權內工作約500餘人。日人數量的不足制約了他們對於協力政權中下層以及地方社會的控制。參見邢漢三，《日偽統治河南見聞錄》，頁212。

¹⁰⁹ 雷雨聲，〈漫話日偽時期的開封商會〉，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開封市委員會編，《面對歷史》（開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開封市委員會，2005年），頁317-322。

¹¹⁰ 邢漢三，《日偽統治河南見聞錄》，頁163-165。

當然協力者中亦不乏利用職權牟取私利的機會主義者。如上文述及的河南省經濟封鎖督導員中，即有部分藉機向商人勒索錢財的。協力官員中自然也有大發國難財的。1939-40年間，河南淪陷區歉收，穀物價格暴漲，時任河南省省長的陳靜齋知悉隴海路東的地區糧食價格較廉，只因日本對糧食貿易嚴加統制，未有流入河南。陳靜齋見此即以協助平糶為由，獲當地的軍特務機關許可，於徐州購糧數百萬斤。陳把糧食運入省境後，部分廉價配售予當地居民，其餘則轉售當地糧商，再把所得收益部分分潤予日人顧問及經手人員，由此名利雙收。¹¹¹ 這些協力者的活動既非為助日，亦非為了抗日，而是另有所圖，反映了日本軍政支配下，協力者行動光譜於「對抗」與「屈從」兩極外的複雜性。

不過，亦不宜過分高估協力者行動的自主性。中國疆域遼闊，中央政府對於地方社會的控制力一向有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迄今仍相當普遍。水至清則無魚，若協力者們大抵「稱職」、「服從」，則作為支配者的日人在一些無關重要的問題上，也可能「睜一眼，閉一眼」，但這種支配者及其附隨者間的無形默契，並不能用於誇大協力者們的自主性。

協力者自主性的侷限，於他們對農村食糧政策的因應上即表露無遺。若說在都市地帶，協力者尚有顧及民眾福祉的空間，那在農村基層，日人與中國人、在地人與在地人間的關係就更為緊張了。特別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消耗的物資劇增，對華北糧棉資源的需求有增無減。¹¹² 各地的軍特務機關因而要求協力政府，不擇手段盡力徵購農產資源。地方縣長明知徵購額度不合理，價格過低，為求自保也不惜動員地方的保安隊、警備隊等，以暴力劫奪農民的糧食。各縣縣警、沿途路警也多藉端勒索、沒收充公周邊糧販的商品。¹¹³ 業績壓力使農村的協力者，更多地擔當了一種爪牙的角色，這時這些協力者無疑就是「把事作盡」了。

事實上，不只農村，都市協力者們在「保民」上的貢獻也是可議的。即使王

¹¹¹ 邢漢三，《日偽統治河南見聞錄》，頁71。

¹¹² 中村隆英，《戰時日本の華北經濟支配》，頁285。

¹¹³ 邢漢三，《日偽統治河南見聞錄》，頁105、124；中華民國新民會中央總會，《全體聯合協議會會議錄》（北京：中華民國新民會中央總會，1943年），頁169。

蔭泰、劉玉書等人，確如其自白書所言，在效力於協力政權期間，仍尋求維護本地民眾的利益，即使他們的行動確有助於維持民眾生活水平及社會安定。但他們的「善舉」，終究仍是建基於日人的默許，以及更重要的，對農民的制度性剝削之上的。王蔭泰本人在1943年度的新民會全體聯合協議會回應農村生活艱難的問題時，坦誠若減輕農民負擔，「專依靠農民生活之七百萬民眾生活何以維持？八十餘萬噸之食糧自何而出？」王、劉等人於自白書未提及的是，他們為都市民眾爭取到的糧食配給，都是日人透過地方政府於農村低價徵購或搶掠得來的，協力者的善舉，實質仍是在慷同胞之慨。¹¹⁴ 日本軍政結構對於華北糧食的再分配，展現出其底層的暴力性及寄生性，協力者保了市民，保不了農民。日人與在地協力者間互相利用的關係，始終是不對等的。從另一角度而言，日人的食糧對策，是優先顧及日人、優先照顧「市民」的；相對應地，中國人，特別是農民的利益，在此軍政支配結構中就受到漠視甚至剝削了。吳應銑提及的「占領的社會學」在此可闡釋為，在一種外國強加的、寄生性的軍事占領之中，所帶來或激化的張力，不只是「民族—民族」之間的，也可以在「中央—地方」、「城市—鄉村」之間產生。這種重層的張力，於食糧對策的落實過程得到了相當的呈現。

在此軍政支配結構下，真正具有「反客為主」潛力的在地群體，不是筆杆子、錢袋子，而是槍杆子。抗戰期間為日人效命的武裝頭目，多為失意軍官，或地方的豪紳、強人，是日本封官許願收買的。他們以「皇協軍」、「治安軍」等名義組成親日武裝，成為日人「以華制華」的工具。戰事後期，隨著日軍在華兵力減少，這些武人乘機坐大，割據地盤，甚至與協力政權競奪農村資源，成為了日人動員在地資源的障礙。

以豫東的附日將領張嵐峰為例。張氏原來是西北軍的失意軍人，但於抗戰爆發後不久獲日軍扶持，依托於隴海路的日軍，迅速於豫東、皖北十二縣建立了自己的地盤。張及其手下的軍官擁有極大權威，通過籠絡地方士紳、商人，形成了在地的利益集團，權威甚至凌駕於協力政府之上。為了維持軍隊，張不單於地盤內徵收糧賦稅項，又與黃泛區以南的國民政府勢力開展大規模的走私活動。其種種舉措均無形破壞了日軍的行政部署及經濟戰略，難怪日人調查員會以「行政力

¹¹⁴ 中華民國新民會中央總會，《全體聯合協議會會議錄》，頁170-175。

滲透之癌」來形容張於當地的勢力。¹¹⁵

某種意義上，這些所謂的「偽軍」透過武力，由下而上地改寫了原來由軍特務機關主導的地方統治秩序。但亦須留意，它們雖然在政治上兩面三刀，但始終托庇於日人之下，不單未曾正面挑戰日軍權威，反而更樂於向弱小者揮刀。與其說他們是在挑戰日本的軍政支配結構，不如說是日人默許附日武裝發展，為未來華北戰局、政局變遷作準備。偽軍並未顛覆日人主導的軍政支配結構，兩者依舊是在地位不對等的情况下彼此利用，協力者的自主性因此亦不宜過分高估。

伍、結論

本文以中國華北地區的日本陸軍特務機關於整個軍政支配結構中的定位及機能為探討目標。首先說明特務機關係統的空間分布、結構定位及內部組織；繼而利用河野又四郎、城野宏及村上政則三位效力於特務機關係統當事人的回憶錄，以「食糧對策」為中心探討軍特務機關內不同成員，由特務機關長、專任職員，到外圍的「軍囑托」等各自的分工，以及軍特務機關作為軍政結構一部分的獨特性格。從軍特務機關內部成員的角度出發，可以看到特務機關的運作，與案牘文書、會議、連絡協調其他部門等官僚的行政業務脫不了關係。而特務機關外圍成員，則更能看到該系統根植於暴力，以強權壓迫地方社會來維持此軍政支配結構的另一面向。通過考察華北協力者於此軍政支配結構下的因應，亦可發現他們雖可在細部處篡改指令、蒙蔽日人，從而維護了個人及社區的利益，但在本質上並無力顛覆及修正此暴力、掠奪性的統治秩序。

在日人於華北維持「點（城市）」與「線（交通）」支配的成說上，本文進一步廓清占領地方支配地方的具體機制。David Serfass深化了「占領國家」（occupation state）的概念，強調日占時期中國的政權，並非單純的通敵政權，而是「日軍、民間組織及本地政府」結合而形成的獨特政體。這些團體之間，性

¹¹⁵ 姜子浩，〈豫東淪陷區偽軍的生存策略——以偽軍與偽政權的糧食競逐為中心〉，《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第32期（2019年5月），頁63-72。

質各異，議程、利益、步調均不一致，這使得占領國家缺乏一般國家應具備的凝聚力。本文在此基礎之上，提出華北地區的占領國家的骨架，是一套以「方面軍」、「特務機關」為中心、往外輻射日人政經團體、中國協力政權，再及至地方社會、一般百姓的同心圓結構，而方面軍的特務機關，是此同心圓結構中的關鍵節點。

現有對日占中國的研究，可以說是「沙漏狀」的，討論上層，亦即方面軍及興亞院華北連絡部活動的較多；透視底層，亦即注意日人、協力政權、與中國百姓在地互動的亦不少。但對於占領國家的政策，如何由中央「垂直傳導」到地方的陸軍特務機關，再由地方的陸軍特務機關為中心，傳導到協力政府、新民會、合作社等實行機構的中間過程，研究相對有限。華北對地方的控制，既以軍特務機關為主軸，這個機構本身的機能及運作，便是理解華北日占區的關鍵所在。本文以「食糧對策」為中心，具體地呈現作為外來支配者的日人，如何運用各地的軍特務機關，通過各種「節點」（軍特務機關及其外圍成員）及「網絡」（日人、協力者等人的在地網絡），把軍政權力擴及農村的過程。對這些節點的研究，也有助於公允地評價協力者們的功能及行動。

在日本帝國整體的層面，河野又四郎、城野宏、村上政則等人的憶述，揭示了華北實行軍政支配的實態，而此種支配形式，又與滿洲國、日治朝鮮、臺灣、乃至華中日占區並不一致。當地民眾體驗到的帝國，自亦存有相當之差異。日人、協力者、在地民眾如何共同且持續地形塑著華北日占區的支配結構及當地社會，他們如何看待自身建設的「成果」，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尚待進一步探討。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海軍一般史料》（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支那事變処理（昭和12.7～12.11）〉。
《陸軍一般史料》（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特務機關に関する総括的報告（昭和20.11）〉。
《陸軍省大日記》（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陸支受大日記（密）第8号2/2（昭和14年）〉。
〈陸支受大日記（密）第72号（昭和14年自12月1日至12月5日）〉。

二、史料彙編、辭典

-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日本侵晉實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第1輯3。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中華民國新民會中央總會，《全體聯合協議會會議錄》。北京：中華民國新民會中央總會，1943年。
外山操、森松俊夫編，《帝国陸軍編制総覧》，第2卷。東京：芙蓉書房，1993年。
外山操編，《陸海軍将官人事総覧 陸軍篇》。東京：芙蓉書房，1993年據1981年版第8刷。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
福川秀樹編著，《日本陸軍将官辞典》。東京：芙蓉書房，2001年。

三、日記、回憶錄、訪談錄

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5卷第50輯-60輯。太原：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3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徐州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徐州文史資料》，第20輯。徐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徐州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2000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開封市委員會編，《面對歷史》。開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開封市委員會，2005年。

文斐，《我所知道的偽華北政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年。

毛德富主編，《百年記憶：河南文史資料大系》，社會生活卷。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村上政則，《黃土の残照——ある宣撫官の記録》。東京：文芸社，2004年。

邢漢三，《日偽統治河南見聞錄》。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

河南會編，《黃河的畔り——河南時代の思い出》。東京：河南會，1980年。

阿部助哉，《黃砂にまみれて——ある特務機關員の青春》。東京：時事通信社，1986年。

袁崇霖，《雪盦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

興晉會在華業績記錄編集委員會編，《黃土の群像》。東京：興晉會，1983年。

四、雜誌

《華北合作》（華北合作事業總會），北京，1944年。

五、專書

中村隆英，《戰時日本の華北經濟支配》。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北支の治安戦（1）》、《北支の治安戦（2）》。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1971年。

石島紀之，《中国民衆にとっての日中戦争——飢え、社会改革、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研文出版，2014年。

巫仁恕，《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 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松元崇、庄司潤一郎、川島真，《決定版 日中戦争》。東京：新潮社，2018年。
- 徐暢，《戰爭・災荒・瘟疫——抗戰時期魯西冀南地區歷史管窺》。濟南：齊魯書社，2020年。
- 張同樂，《華北淪陷區日偽政權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
- 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日中戦争の実相》。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
- 陳耀煌，《中國農村的副業、市場與共產革命，1900-196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年。
- 劉鳳翰，《抗日戰史論集—紀念抗戰五十周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
- 蕭李居，《合作或衝突——防共問題糾結下的中日關係（1931-1945）》。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年。
- 關智英，《対日協力者の政治構想—日中戦争とその前後—》。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9年。
- Brook, Timothy.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acKinnon, Stephen R.,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tirk, Peter M. R.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Occupa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 Young, Louise.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六、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加藤陽子，〈從軍事史的角度來看中日戰爭——關於興亞院的歷史定位〉，《抗日戰爭研究》，第91期（2014年2月）。
- 朱燾，〈日軍需求與鄉保「合作」：溫州樂清淪陷期間鄉村秩序的重構〉，《二十一世紀》，第182期（2002年12月）。
- 姜子浩，〈豫東淪陷區偽軍的生存策略——以偽軍與偽政權的糧食競逐為中心〉，《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第32期（2019年5月）。
- 柯絳，〈日本在華特務機關調查統計（1935-1936年）〉，《民國檔案》，第43

期（1996年2月）。

張勁松，〈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述略〉，《日本研究》，第67期（2001年8月）。

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1995年6月）。

Serfass, David. “Collaboration and State Making in China: Defining the Occupation State, 1937-1945,”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7:1 (January 2022).